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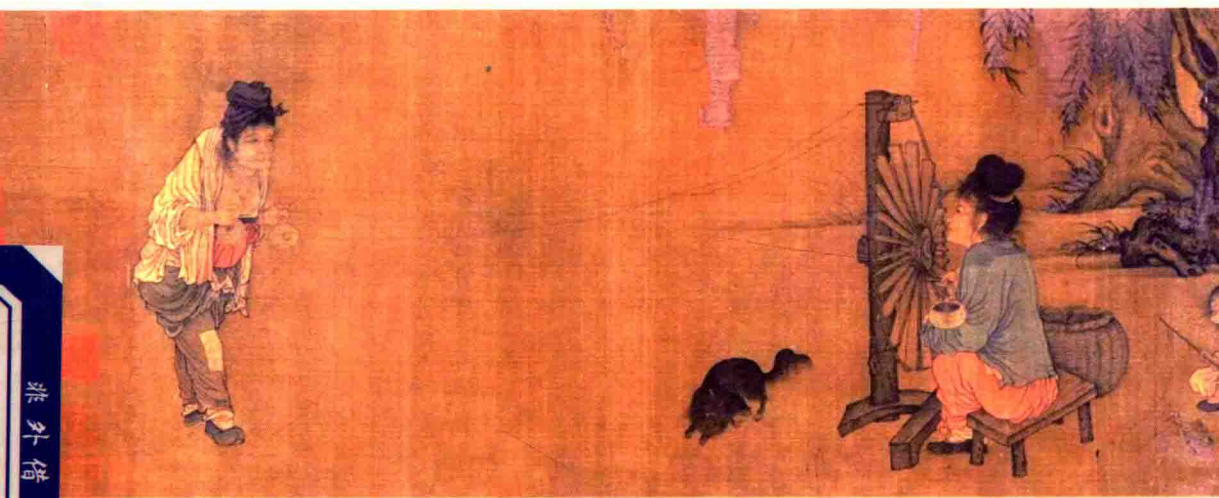
宋代教育研究丛书

总主编 赵国权

多元与开放

社会大变局中的
两宋女子教育生活

赵国权◎著



非外借



科学出版社

宋代教育研究丛书

总主编 赵国权

多元与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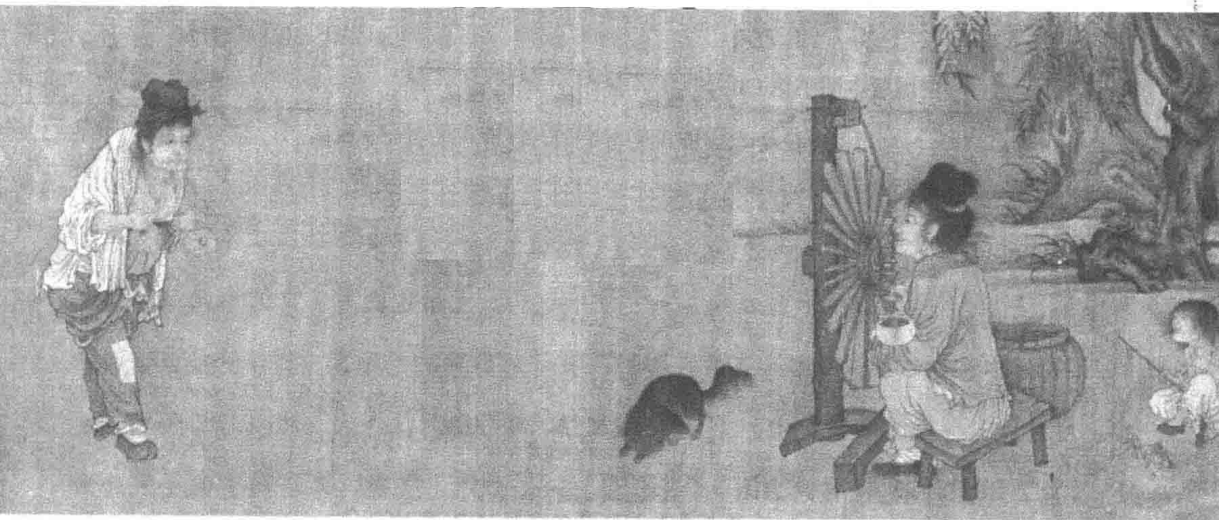
社会大变局中的
两宋女子教育生活

赵国权◎著

本套丛书系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科

『宋代教育研究』特色重点资助项目

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资助项目（2016YBZZ050）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处在“大变局”中的两宋社会，给女子参与社会及教育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书依据社会学上的角色理论，从自然人、家庭人和社会人三个维度及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学、艺术学和考古学等多个学科角度，来探讨处于“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各个层面的教育生活。通过两宋前后及中外比较，确立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在中国乃至世界女子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本书适合社会学及妇女史研究者、历史或教育史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对中国历史、宋史、生活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与开放：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 / 赵国权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3

(宋代教育研究丛书 / 赵国权总主编)

ISBN 978-7-03-064475-6

I. ①多… II. ①赵… III. ①妇女教育-教育史-中国-宋代 IV. ①G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35337 号

责任编辑：付 艳 卢 森 / 责任校对：贾娜娜

责任印制：李 彤 / 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20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2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3/4

字数：347 000

定价：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序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所有王朝中，唯独宋朝所引发的争议最多，是“盛世”还是“衰世”，是“开放”还是“保守”，是“中兴”还是“偏安”等，见智见仁。也正因为如此，其才吸引国内外诸多学者不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思考、评判、建构。诸如国学大师王国维称：“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史学大家陈寅恪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再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法国学者谢和耐的“文艺复兴”说、美国学者费正清及 L.S.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商业革命”说等，他们都站在世界史的角度来反思宋朝的划时代变化，着实能让人对以宋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充满自信。

带着这份自信，立根于北宋都城开封的河南大学人，对宋文化自然情有独钟，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自 20 世纪 80 年代就揭开了多学科、大团队聚焦宋史研究的序幕，接连出版了《宋代文化史》《宋代教育》《宋代地域文化》《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等系列专著。其中苗春德主编的《宋代教育》可谓全面系统研究宋代教育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一部较早的断代教育史研究专著。

有此研究背景和基础，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在 2000 年申报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时，在教育史专业里面专门设置一个“宋代教育”研究方向，深得评审专家的认可。从 2002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至今，凡是入读中国教育史方向

的硕士研究生，基本上都是把宋代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此同时，教育史前辈苗春德教授及当下中国教育史团队的赵国权教授、张建东副教授和刘保兄副教授，无论是论著创作、课题申报还是博士论文选题，也多以宋代教育为主，业已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学院也将“宋代教育”作为重点培育的研究方向，还成立了“宋代教育研究所”作为特色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加以支持。

为充分展示近年来我们中国教育史团队的宋代教育研究成果，学院特组织一套“宋代教育研究丛书”，共有五部书。其中，有两部属于个人专著：①赵国权的《多元与开放：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基于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用社会学的角色理论，从自然人、家庭人、社会人三个活动区域或空间维度，对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在生活叙事、场景再现和文学书写等层面进行深度描述，借以充分展现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真实情形，并从宋史、中国史和世界史三个角度，对两宋女子教育生活予以准确定位。②张建东的《宋代游学活动研究》着重探讨宋代学者往返官学、书院、私学之间的游学活动，以及所体现出的游学内容的丰富性、游学目的明确性、游学阶层的下层性等特点，认为游学活动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磨砺出了一批名士硕儒，缩小了各地教育发展的差距，对文化传承、教育平民化、儒家道德教化的重心下移以及尊师风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三部属于师生合作的宋代教育专题研究成果：①赵国权等著的《宋代“家国同构”下的多元社会教化研究》，主要探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伦理与社会教化，包括两宋生活伦理的同一性问题、二程及王安石的社会教化思想等；二是孝道与家庭教化，包括孝道教化的路径、家庭教育建构及“三槐”王氏家族的教育活动等；三是科举及科普教化，包括科举与党争、民间教育传播、医学及科技教育、教育与图书出版等问题。②张建东等著的《宋代教育制度的重建与再生研究》，从官学、私学和书院三个层面剖析宋代教育制度的架构，官学方面论及太学生参政活动、官学经费以及河南地方官学的建制等，私学方面论及私学的管理制度、蒙养教材的编写以及女子教育问题等，书院方面论及书院经费、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嵩

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研究等。③刘保兄等著《宋代学人的教育思想研究》，针对周敦颐、胡瑗、范仲淹、司马光、苏东坡、杨时、胡宏、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杨简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从道德、教学、书院、家庭、生命、实学等不同的角度进行挖掘和阐释，充分体现出他们对教育的忧患意识和终极追求。

丛书由赵国权教授发起、策划，并担任总主编和统稿事宜，张建东副教授、刘保兄副教授以及数十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们全力协助，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气象必有新作为，我们有信心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出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无负于这个新时代！

“宋代教育研究丛书”编写组

2019年12月26日

序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将公元前500年左右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为“轴心时代”，认为此时各地所诞生的思想家群体及其所原创的各种思想理论，不仅给蒙昧的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而且对后世各种社会形态或制度下的文化教育均产生重大影响，且这种影响至今仍在持续着。值得注意的是，因受政治、战争或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印度及西方的古老文明都曾出现过断裂现象，然“能够悠久而又绵延不断，源远流长，古老而又风韵常存的，唯有中国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哺育的教育”^①，这是因为中国教育文化博大精深及切于实用，还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及同化力、适应力，使诸多少数民族军事上的胜利者同时又成为中国文化教育上的臣服者。因而，在世界教育文明史上，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么，在轴心后时代的中国教育文化发展进程中，宋朝的文化教育可说是达到了一个鼎盛发展期。对此，国内外史学界多有共识，如史学大家陈寅恪曾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学者邓小南认为，两宋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都已达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政治文化

^①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形态、精神风貌方面呈现出“世俗化、平民化、人文化的明显趋向”，因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学者葛兆光同样认为，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出现一个“质”的变化，甚至导致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对中国史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一书中提出“唐宋变革”说，引起学界较大反响；法国学者谢和耐在其专著《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更是认为宋朝在“追溯经典传统，传播知识，科技飞跃发展，出现新哲学及新世界观”等方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业已形成“自身的独特性质”，因此喻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宋朝文化教育的繁荣，为同时代的女子教育生活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回溯自社会分工以来，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就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在传统的历史著述中，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和配角出现的，处于失语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因而所谓历史只是男性的历史而已”^①。那么，如何跳出传统的女子“从人”观，将两宋女子及其教育置于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考察，以重新认识社会大变局给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重新解读两宋女子的社会地位、生活样态及教育情形，重新评价两宋女子受教后对个人生活、家庭和谐、社会发展所发生的积极效应，最终来重新书写两宋女子教育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探究的一个话题。

而今有幸看到，以研究宋代教育见长的赵国权老师，在相关史料犹如大海捞针的情况下，将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以社会角色理论为统领，运用大史料观及多学科视角，从自然人、家庭人、社会人三个维度，对两宋女子各类角色的教育生活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大胆提出两宋尽管处于高度动荡的社会大变局，但却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中国古代女子

^① 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教育生活也由此进入黄金时代。不仅如此，他还把两宋女子教育生活放在世界大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与同时代的世界各国女子教育相比对，得出两宋女子教育生活是同时代世界女子教育生活实际上的“领跑者”，因此“它不独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这种不同于传统描述的另一番别样诠释，不仅突破了以往学术界“宋代是程朱理学泛滥，中国女性被奴化最严重时期，没有女子教育”的陈说，而且深化和发展了国外历史学家内藤湖南、谢和耐以及中国前辈史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钱穆与当代史学名家邓小南、葛兆光等“宋代盛世论”的观点，确实难能可贵。从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一个趋向理性、开放、包容的社会生活业态下，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亦呈现出多元、向上、自觉、自主之态势，在中国社会生活及教育生活史上真可谓独领风骚。

诚然，如对两宋具有宗教信仰女子以及少数民族女子的教育生活史料做进一步的挖掘和补充，会使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更加丰满。期待赵国权老师在此研究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是为序！

周洪宇

2019年12月16日

目 录

丛书序

序

导论	1
第一节 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的初衷	1
第二节 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的百年回顾	5
第三节 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的理论支撑及方法	11
第一章 社会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的催化剂	15
第一节 文化变迁与下移：从“重文”到重女教	17
第二节 制度建构与人文关怀：从意识觉醒到独自维权	24
第三节 社会生活的变迁：从角色固化到重塑	36
第四节 民族间的交融与冲突：从忠君到生成爱国情怀	49
第二章 作为自然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55
第一节 性别之教：予以性别规训与认同	56
第二节 饮食之教：形成习惯及自觉	59
第三节 佩饰之教：传统与时尚交汇	64

第四节 强身之教：从戏玩到竞技	70
第五节 “成人”之教：“笄礼”与“乞巧”	77
第六节 生死之悟：求生与释然	80
第三章 作为家庭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83
第一节 为人女之教：立身处世做“孝女”	84
第二节 为人妻之教：柔顺事夫做“贤妻”	96
第三节 为人母之教：养育子女做“良母”	115
第四节 为人媳之教：孝公婆勤理家使为“顺媳”	148
第四章 作为社会人的女子教育生活	167
第一节 道德规训：在濡化中成人	168
第二节 知识涵养：在阅读中沉淀	177
第三节 生存技艺：在做学中养成	187
第四节 社会阅历：在交游中丰富	207
第五节 宗教信仰：在修行中超越自我	213
第五章 回应大变局：女子教育生活样态与检视	231
第一节 教育与生活融为一体：书写女子教育的“本真”	232
第二节 教育生活的时空增温：传承中的开放与时尚	239
第三节 “母教”在生活中拓展与深化：教育生活的完美建构	243
第四节 巾帼不让须眉：女子教育生活的终极呈现	249
结语	257
后记	268

导 论

通过阅读大量史料,笔者发现处在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生活别有洞天,有必要以社会角色理论为引领,从自然人、家庭人和社会人三个角度,对两宋女子教育生活进行全方位探究,以期能还原一段真实的女子教育生活。

第一节 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的初衷

研究两宋时期的女子教育,所依靠的史料不仅少之又少,且碎片化严重,查找起来犹如“大海捞针”,但强烈的使命感又迫使笔者必须砥砺前行。

1. 女子教育史应成为教育史研究的另一半

如果说历史是人创造的,那么所谓的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按理说,创造历史者,无外乎男、女两种人,缺少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历史的发生和延续。但理论与现实有些时候是割裂的,至少在古代,受男主外“不言内”、女主内“不言外”观念的影响,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安邦治国之大事总是由男子担当着,似乎与女子无关,以致书写历史者也总是让女子“走开”。对此,学者多有诟病,如王学典认为:“在传统的历史著述中,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和配角出现的,处于失语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因而所谓历史只是男性的历史而已。”^①国外亦有学者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主流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分析都有偏见,对于他们来说,男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②

不仅是历史学科,作为历史学科一个重要分支的教育史学科来说亦是如此,一部古代教育史其实就是一部男子教育史,因为历朝历代均不曾专为女子办学而使其接受教育,女子一直游离于官学大门之外,所以几无教育制度可言,亦无多少教育理论可书,写史者也自然不会太在意关于女子教育的那些细端末节之事,

① 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7页。

② (瑞典)I. 胡森、(德)T. N. 波斯尔斯韦特:《教育大百科全书》第2卷,张斌贤等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甚至是认为“无足称述”。如此被建构的、男人一边倒的教育史，并不能说明女子教育可有可无，而是同男子教育一样重要，甚至在家庭这个层面，女子受教育的价值更为凸显。何况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太任的“能胎教”，就不会有周文王的“生而明圣”；没有孟母的三迁其居，也不会成就一代“亚圣”孟子；没有岳母刺字，也不可能有岳飞的“尽忠报国”。或者说，古代的家庭教育多是由“主内”女子承担的，无论是王公贵族抑或是平民百姓，无论是“独善其身”的“隐者”抑或是“兼济天下”的“显者”，无不接受过良好的家教，也无不受益于良好的家教。可以说，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个母亲的家庭留守或“主内”，可能也成就不了成千上万个功勋男儿。

但历史的“熟视无睹”并不表明女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的，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来接受教育。故有学者称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女子教育机构，但以女性为对象的“女学”颇为发达。可以说，人生必受之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面的教育，女子至少占据其二，在古代女子只是比男子少个官学教育而已，因为私学也是为幼小女童开放的。

正因为女子教育的价值所在，所以需要借助研究走进那段历史，走进历史中的女子，用新史料、新视角对女子教育进行多维解读，以此来还原历史的全部，追寻历史的本真和教育的“原生态”，以此表明女子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时代色彩极具凸显的过程；旨在让女子教育合乎逻辑地走进历史，让女子也和男子一样成为历史的主人而非男子或历史的附属品，并最终如美国妇女史学家琼·凯莉所言：“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①虽已有一批学者，先后或断代立论或通史立论，但学无止境，对女子教育史的研究也远没有止境，尚未被关注及未发现的研究领域尚多，拓展的空间颇大，亟须加强和深化。

2. 对社会大变局中的两宋女子教育研究有必要再深化与再解读

史学界普遍认为两宋处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葛兆光更认为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②。那么，如何跳出传统的宋朝“衰世”论及女子“从人”观，将两宋女子及其教育置于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考察，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探究的话题。

然而就目前对两宋女子教育的研究状况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缺憾。

一是研究模式有局限。就近几年有关两宋女子教育研究的成果来看，基本上是从女子教育目标的定位谈到女子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或整体而论之，或分仕宦、平民等阶层阐释之；或述及宫廷、家庭等非正规教育路径，或专论司马光、袁采、

① 叶汉明：《女性主义史学与中国妇女社会史——当代西方研究的批判及中国妇女史学的展望》，载张妙清、叶汉明、郭佩兰：《性别学与妇女研究：华人社会的探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②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0页。

朱熹等几位名家的女教理论；或就某个家族的女子教育加以点评，或就李清照、朱淑真等卓有成就女性做个案例分析等。

二是研究成果少。周愚文认为，以往的教育史研究侧重于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教育人物等三个领域，至如“妇女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就显得稀少，甚至有被忽略之感”^①。整个教育史研究如此，对两宋女子教育的研究更是如此。方建新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②，收录了20世纪中国学者宋史研究论著41 000多条，在“社会·妇女”及“教育”栏目中，所收论著大都侧重于婚姻、贞节、财产及职业等方面的研究。与两宋女子教育相关的，只有吴鼎1944年在《文化先锋》上发表的《宋明以来之母教（四千年来中国母教简史稿之三）》及陶晋生1996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北宋士族妇女的教育》两篇文章，以及周愚文1996年撰写的《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涉及两宋时期的女童教育）一书。进入21世纪后，学界对两宋女子教育的研究，专著及博士论文尚无，硕士论文不足8篇，期刊论文不足13篇。如此薄弱的研究成果，与两宋时期女子教育的成就与地位是远远不相称的，亟须将两宋女子教育放在“大变局”这一社会背景下进行再认识、再解读，以期有一个新的理论建构和教育图景再现。

3. 伴随史学研究的生活转向，有必要从生活史的角度来审视两宋女子的教育生活

马克思曾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③事实上，学界所遵循的多是学术研究服从政治需求这一历史规训，以致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题史研究，总是对政治、军事、经济及贵族精英阶层或人群情有独钟，而对普通民众及日常生活常常不屑一顾。真正将大众日常生活推入学界视野，并实现史学研究向人类学转向，当是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主要体现在：①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②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③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④可以说，这种影响促使史学研究成功地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在此基础上，史学界又有诸多理论上的创新。如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学者卡洛·金兹伯格等提出“微观史学”理论、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兹又提出“深度描述”理论等。至20世纪80年代，美

① 周愚文：《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页。

② 方建新：《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④ 本书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

国学者林·亨特等发起“新文化史”运动，提倡研究者的视野更多地移向社会下层民众，通过对普通人物身上发生的一些细小事件和生活中的一些琐碎问题的研究，来阐释社会发展中的一些主流现象或文化。

伴随西方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和生活转向，中国史学研究也悄然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学界普遍注意到史学研究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以社会生活为主题的论著相继问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生活史论著就是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

自20世纪90年代后，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开始普遍下移，即“从过去传统的领域挪开，开始稍稍从中心转向边缘，从主流转向支流，从经典转向世俗；从研究的对象来说，从重点研究国家、精英、经典思想，转向同时研究民众、生活、一般观念；从研究的空间来说，从重点研究中央、国家、都市，转向兼顾研究区域、边地、交叉部位”^①。进入21世纪后，对生活史的研究愈来愈向深入挺进，学术成果如雨后天春笋般呈现，尤其是对于两宋时期生活史的研究亦成果斐然，诸如尚园子等《宋元生活掠影》^②、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③、汪圣铎《宋代社会生活研究》^④、谭刚毅《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⑤、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⑥、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⑦、刘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与鬼怪》^⑧等。

受史学研究生活转向的影响，教育史学面对已往研究的“高位化”及遭遇的“瓶颈化”，面对研究成果被历史学界难以普遍认可的尴尬，同样也在积极寻找新的支点和突破，也就是在逐步地进行活动或生活转向。2008年，周洪宇率先提出要实施“教育活动史”研究，再生性地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进而又提出要将研究的视野逐步地下移和对外扩散，以“实现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中心向边缘、从经典向世俗的过渡”^⑨。之后，周洪宇又开启教育生活史研究，认为教育生活史是多学科“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学术源头上属于教育活动史的范畴，从整体上看是教育史特别是教育活动史研究的延伸”，其主要特点是要呈现一个“鲜活的微观世界”^⑩。《多样的世界：教育

①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8页。

② 尚园子、陈维礼：《宋元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年版。

③ 李春棠：《坊墙倒塌以后——宋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2006年版。

④ 汪圣铎：《宋代社会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⑤ 谭刚毅：《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 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⑦ 方健：《北宋士人交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⑧ 刘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与鬼怪》，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年版。

⑨ 周洪宇、中国昌：《教育活动史：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教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11—16页。

⑩ 周洪宇、刘训华：《多样的世界：教育生活史研究引论·总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生活史研究引论》的出版,标志着教育史学向教育生活史研究的成功转向。

总之,年鉴学派促成史学研究的生活转向,进而又推动教育史研究的生活转向,对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的研究自然是史学或教育史学发展转向的必然诉求。

第二节 两宋女子教育生活研究的百年回顾

学术研究只有在整体把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创新,忽略这一点,只能做一些毫无意义的重复性研究。因而,对已有两宋女子教育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非常必要。截至目前,对两宋女子研究成果的学术回顾已有多篇问世,但对两宋女子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几无涉及,且尚无针对两宋女子教育研究成果进行的专门回顾与分析。

如果说在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前,历史对两宋女子教育的文本记载属于原始资料积累的话,那么自1902年中国教育史学科诞生之后,伴随社会之进步及史学研究的生活转向,尤其是对妇女史研究的持续关注,学术界也开始对两宋女子教育问题予以思考、关注和系统研究。就所查阅到的历年来学术研究成果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且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研究取向和标志性研究成果。

1. 从酝酿走向局部或断续关注阶段(1902—1984年)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发展缘于1902年新学制改革的推动,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三个部分,其中师范教育需要开设教育史课程。于是,就将日本学者狩野良知编著的教育史教材翻译过来以为应急。之后,国人开始自主编写中国教育史类教材或论著,对先秦女子教育多有论及,且多本之于《礼记·内则》所载,对秦之后的女子教育则没有涉及。不过,1925年姜琦的《女子教育问题之研究》一文,给研究古代女子教育倒是带来一些新的思路:一是对女子教育的定位,从生理、心理和社会三个角度加以论证,认为女子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养成完全的女子人格,使之“成为真女子”。而对于传统的“贤妻良母”观,他认为还是很有价值的,只是不能当作女子教育的唯一目的,只可当作教育目的中的一部分。二是关于古代男女教育不平等,他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加以解释,认为“女子身体的组织及其精神的状态,和男子有种种不同的地方,两者的教育当然是稍稍各异的”,因而对女子来说应该“就着女子的特性,使她们自己发挥,或施以一种特殊的影响”。^①

^① 姜琦:《女子教育问题之研究》,载姜琦等:《女子教育之问题及现状》,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10页。

陈东原曾有撰写女子教育史的计划，但考虑到“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女子教育，她们所有的教育，是和妇女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与其要做女子教育史，倒不如放大了来做妇女生活史”^①。于是便撰写《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该书对生活史尤其是妇女生活史研究而言，也是有开创之功的，对两宋女子生活史的研究也自有独到之处，诸如将两宋妇女观的变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即宋初前 50 年为继承期，对于妇女贞节的观念“都很宽泛，同从前的人差不多”；第二个时代即宋初 50 年至 70 年为变化期，对于妇女的观念“有的宽泛，有的严格”；第三个时代属于理学诞生期，也是妇女正统观念确立期，更是两宋“妇女生活的转变时代”。^②接着，他从“宋儒对于妇女的观念”“社会对于离婚再嫁的态度”“男性的处女嗜好之产生”等角度来逐一阐释，其中也含有教育的因素，只是没有单列论之而已。

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有学者局部关注两宋女子教育问题，且将女子作为施教者的身份加以初步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吴鼎于 1943—1944 年接连发表的有关“母教”的系列文章。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对“母教”这一话语以及“母教”的地位和作用予以明确界定，提出“母教”即“母亲施于子女之教育”，且自古有之，认为“历代之英雄豪杰，以及成功立业之人，其成功之因素，大半由于优良之母教而来”；二是对自古至民国时期的 42 位母亲逐一加以介绍，其中包括两宋时的刘安世之母、欧阳修之母、程伊川之母、陈尧咨之母、吕荣公之母、刘当可之母等六位母亲。^③

1957 年胡文楷编著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对两宋时期的朱淑真、李清照、杨太后、韩玉真等 43 位女子的著作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从中也能粗略看到这一时期女子的著述生活及教育成就。之后一直到 1984 年，没有查阅到有关两宋女子教育研究的专论文献，一些论著中曾有些片言只语，但只能说是断续关注，谈不上立论性研究，说是处于一种长时间段的失语状态显然更为合适。

2. 从局部或断续关注通向整体研究阶段（1985—1999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世界性的妇女学研究的兴起，女子教育问题再度进入学者的视野，女子教育史研究的沉寂局面被打破，并出现一丝曙光。毛礼锐在《中国教育史简编·序言》中称：“科技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儿童教育、妇女教育等等，在中国教育史上也都有一定地位。”^④虽然该书古代部分按专题将“科技”“体育”“美育与社会教育”等都列为专章，“妇女教育”却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自序》，上海书局 1937 年版，第 1 页。

②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局 1937 年版，第 132—139 页。

③ 吴鼎：《中国古代之母教：四千年来中国母教简史稿之一》，《文化先锋》1942 年第 1 卷第 10 期、1944 年第 2 卷第 7 期。

④ 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序言》，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 页。